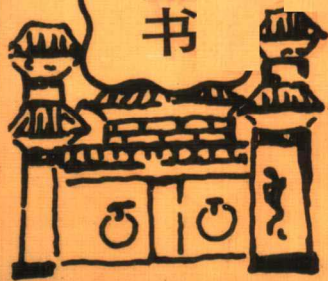


白话中国古典精萃文库
(卷二十九)

通典

—

典制的百科全书



(文化普及珍藏版) 共52卷

通典

石全亮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通典——典制的百科全书
tong dian——dian zhi de bai ke qüan shu
石全亮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3 千字 开本:787×1092^{1/32} 印张:5.5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任 宁
封面设计:王凌波 胡萍丽 责任校对:王小明

ISBN 7-5313-0884-3/I·807

定价:3.68 元

总定价:258.00 元(套)

主 编:王德昌

副 主 编:娄 方 任 宁 陈建辉

编 委:宁湘伟 郭 衍 梁路光
郭鼎文 孙也丁 李慧蕾
青 晓 杨冬伟 尹 杰
杨 青 金春玉 刘 多
王 丹

原著者简介

通 典

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作者杜佑曾任唐朝节度使和宰相等职，对中央及地方制度极为熟悉，他采录历代典籍，溯寻制度的因革变迁，希望为大唐帝国写下一幅臻于理想的政治蓝图。《通典》就是一部古代与现代的对话，理想与实际的结合。

出版说明

古典著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她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既反映了历史长河中华夏子孙的思想道德观念,也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诸方面的社会生活。

那么,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下去?又如何在浩如烟海、纷繁复杂且文言、古体、生涩又难解的历代经典中得到启迪,受到陶冶,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呢?本书的指导思想就在于为广大读者一解其忧。

本系列丛书以我国历代经典著作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五十二种,它以浅显、生动的白话文体,对每部经典或简或繁地进行了再创作。简者通俗易懂,繁者使原典更加充实。既保持了原典的精神,又对原典进行了再发掘;既有原典的释译,又有作品、作者的介绍及历史背景的讲解,突出其通俗性和故事性;既可使初学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学习古典著作中踏出一条捷径,一步步走向原典;也可为专家、学者、省却查阅冗繁原典的时间。它适合于不同年令,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

本丛书以《论语——诗人的圣经》开篇以《镜花缘——镜子里的神话》结束,约千余万言,历时数载。是数十位史学工作者、专家、教授心血的结晶。

古典精萃文库,伴您走上成功之路!

编 者

目 录

杜佑与通典	(1)
自序	(19)
一、食货	(21)
二、选举	(39)
三、职官	(48)
四、礼	(79)
五、乐	(93)
六、兵	(98)
七、刑.....	(110)
八、州郡.....	(114)
九、边防.....	(134)
原典精选	(144)
一、旧唐书杜佑传.....	(144)
二、清圣祖御制重刻通典序.....	(149)
三、通典原序.....	(149)
四、通典序.....	(151)
五、通典食货门论曰.....	(153)
六、通典选举门评曰.....	(155)
七、通典职官门论曰.....	(158)
八、通典礼门序.....	(160)
九、通典乐门序.....	(164)

杜佑与通典

中国历史上以百科全书式体裁出现的史书，最著名的首推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但是，从“史记”以降，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叶，编纂巨大篇幅的百科全书式史书不复再现。其中的原因固然是时代环境的变幻无常，朝易夕改，动乱的世界之下，很难定下心来专心一意地从事长期编纂的工作；另一方面，随着时代愈后，累积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愈多，加以学术的分工愈细，庞大编纂工作已经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单独负担，个人往往穷一生之力而皓首白经，很难突破这一限制，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工作的艰难。

大唐帝国统一海内之后，在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以前，处于长期的繁荣富庶，政府也大力推动各项学术工作的发展，奖掖学术。科举的设立，更使得天下士子竞相投诸其流，形成了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与良好的学术环境。后来，虽然唐室迭遭大难，东方藩镇势力兴起，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危，但李唐的国祚命脉却也能不绝如缕，继续维持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措施也尚能大致施行，不致因种种变乱而告停顿，表面上犹可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形象。

时代的动荡，世事的变幻，最容易使人产生各式各样的思想。有人感叹世事无常，醉心释氏；有人目睹世局不安，遁入山林，归于老庄；也有人眼见国家兴亡，危如累卵，亟思

力挽狂澜，拯救生民疾苦。

就史学来说，将近千年的蕴育累积，顿时之间遭遇大变，常使有心者以历代兴亡为鉴，思古幽情，希望藉着学习既往历史教训而有所惕厉振扬。中国史学就在这种情况下，以唐代刘知几为分水岭：刘知几总结了以往的历史著作成绩，汇成一部“史通”；相反的，杜佑即以“通典”开创出史学的新领域。

二

唐玄宗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安史之乱以前，大唐帝国声威远播，达到前所未有的富庶强大；此后，国势如江河日下，再加上朝廷内有宦官跋扈，朋党相争，外有藩镇肆虐，外患频仍，交相进逼之下，中晚唐的政局并不算稳定。

杜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长的人物，也是这一时代的见证者。他虽然在宦海中浮沉升降了六十年之久，也曾历仕六朝，位极人臣；但是，他对唐代中叶的紊乱政局，并未产生丝毫振衰起弊的作用，更谈不上有拨乱返治之功。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所修撰的“新唐书”上，对他的评语是：

淳儒，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以大节责之，盖珉中而玉表欤！

意思是指杜佑为一道地的读书人，如果在升平治世的时代，还可望有一番作为，但是碰到中唐这种混乱的环境，就欠缺大魄力与大担当了。

然而，历代之所以赞美“通典”，并不是因为杜佑在政治

上位居高位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编撰了一部“通典”，罗列古今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损益，内容详赡，脉络分明，可说是典制史上一座蕴藏丰富的史料大宝库。底下就分别说明杜佑为什么编撰“通典”？如何编撰？具备那些特点？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何在？

三

古人说：江海不捐细流，乃能成其大；泰山不让细壤，乃能成其高。唐代的史学，也正表现出这一种蓬勃的气象，一方面纳川汇海，总结魏晋以来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唐宋以后的契机。当时史学家中较著名的有专门注重名物训诂研究的颜师古等人，有侧重研究史书体例的刘知几，也有意在典章制度的赵仁本、蒋×等人，稍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群说毕出，蔚为大观。

以典章制度为主的史书，在中国正史之中，就是所谓的“志”与“书”一类，如“史记”有“平准书”、“封禅书”，“汉书”有“食货志”、“礼仪志”等。除了史、汉二书外，其余的大都专记一朝一代的典制，很少有贯通古今的记载。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典制史撰述的风气逐渐形成时尚，而且从正史里面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唐朝初期，以著述一代典章制度而单独成书的有李延寿“太宗政典”，到中唐有苏冕“唐会要”、刘秩“政典”，到晚唐还有王彦威的“唐典”等，都是同一类的著作，说明在杜佑“通典”问世的前后，撰述典制史已经形成一股学术风气，不断冲激着史学界。

四

“旧唐书”“杜佑传”上记载唐玄宗开元末年时，史官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挑选中国经、史、百家的记载，依照“周礼”所描述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职制，撰写一部三十五卷的“政典”，极享盛名，大为当时著名学者专家的赞誉。而杜佑自从看到了刘秩的“政典”以后，潜心探索其中蕴含的精义、主旨，他认为“政典”的条目、内容都还不够完备，因而加以扩大增广，并且补录了玄宗时代的开元礼和开元乐，撰述完成“通典”一书，共二百卷。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也曾经记载说：当代叙述兵制，全都取材于“通典”，而“通典”虽然是杜佑所收集编纂，但它的源流乃是出自刘秩。

宋朝距离唐世尚不远，这二种记载都直接指明“通典”本于刘秩“政典”，应当是不错的。然而，除此之外，玄宗开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年），宰相张九龄、李林甫等人曾编修一部名为“六典”的书，有三十卷。它的内容是以周代官制的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与十二卫为纲要，罗列了每一个职官的职掌，记载了每一个职官的品级，而整部书也是模仿“周礼”。由此，可以知道“六典”和“政典”都是以“周礼”一书为蓝本，性质相类似的著述，并且均是杜佑撰写“通典”的主要依据。

除了上面所说的二书以外，“通典”另一个重要的史源是玄宗开元二十九（七四一年）颁行的“大唐开元礼”。杜佑曾经赞美这部书是：“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名，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为盛矣。”

在总数达二百卷的“通典”里，关于礼的部份有一百卷之多，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杜佑对礼的次序，排列为吉礼、宾礼、军礼、嘉礼与凶礼。这种排列，并不是杜佑首创，早在唐初所修撰的贞观礼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次序，而开元礼沿用贞观礼、显庆礼，“通典”又加以承袭罢了。但是，通典将原为一百五十卷的开元礼删节为三十五卷，这种取材方式，疏漏自然在所难免；所以清赵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特别称誉开元礼的赅洽完贍，凡是朝廷礼仪有疑问时，稽考开元礼就可以得到解答，若是国家有盛大的举动仪式，依照开元礼记载就可以实行，推崇它是一部研究“礼”制的圭臬。相对的，对“通典”就颇有微词了。

关于乐的方面，中国从先秦以降，乐经失传。虽然学者常常拿礼乐并称，实际上却很少有人专门去研究乐。唐朝建国以后，高祖、太宗采用隋朝的乐，命令祖孝孙、张文收二人研究制定，但是并无完整的规章流传下来，史书上的记载也仅仅是聊备一格；因此，杜佑在撰写“通典”乐门的时候，也感到资料非常贫乏，极为困扰，最后只好收集了开元年间制定、通行的乐，加上历代沿革经过的大概而定。

在礼、乐与政制以外，唐朝还有一批学者专心致力于州郡、边疆地理以及外蕃诸夷民族的研究，成绩也相当烱然，颇有可观之处。这种风气的盛行，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的提倡、监督，如政府规定地方州府必须三年一造地图，对唐帝国域外的国家由中央政府的鸿胪寺派官，负责讯问各国的使臣、侨民，记录每一个国家的山川风土，然后制成地图，报告给朝廷。最有名的地理书籍，稍早有唐高宗时代，许敬宗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详细记载西域各国的风俗物产。武则天时也曾经下令尚献甫召集学者修撰“方域图”。这些记载到了玄

宗天宝年间，与实际情形不相符合，改变甚大，因而时时下令加以修改。

唐玄宗以后，最著名的地理书籍首推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撰的“海内华夷图”，以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称得上是巨细靡遗，莫不备载。贾耽经常到出使夷狄的使臣那里，询问风俗，深明当时天下地土、区产、山川与夷阻，“新唐书”即极为赞美他的著作。

贾耽的书，今天虽然多已失传，但他是和杜佑同时代的人物，他的著作也是在德宗贞元十七年（八〇一年）完成奏上，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通典”本于贾耽的著作，但推测杜佑曾参考他的著作，或者采用相同来源的资料，应是极为可能的事情。况且杜佑的父亲杜希望曾经担任过和亲判官这一职务，出使吐蕃，又出任鸿胪卿，主管外国事务，他和贾耽应当也有过交往才是。换句话说，杜佑就在这种种风气与家学的交互影响之下，从事“通典”的撰述工作。

五

说明了唐代的史学环境与“通典”撰述的时代背景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介绍杜佑的生平。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人。他的家世在唐代甚为显赫，杜氏一族仕宦至宰相的人多达十余位。杜氏这一系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共分为杜陵、京兆、襄阳、恒水与濮阳等五个分支，杜佑他自认出自杜陵这一支，但也有历史学家考证他是出于襄阳一支的。

杜佑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年）。当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上虽经常有契丹、奚、突骑施、吐蕃等外族

的骚扰，但是中国的殷富丰饶已经达到唐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颠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描述开元末年的富庶说：

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杜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富庶繁荣、人文荟萃的首都长安渡过。但他自小读书，就不喜欢那些专讲对偶章句、华丽辞藻的文章，终于未能与流俗一样，自时下盛行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是以他父亲的官位荫任补官。

杜佑正式踏入官场，大约在玄宗天宝末年到肃宗至德初年期间。这时候唐帝国国势颓危不振，历史上所谓的安史之乱、建中之变、永贞内禅等事变都是在杜佑的生平期间发生。当时杜佑或是在朝廷任职，或是出镇担任节度使，终他的一生，都没有卷入各种政治风潮，也没有参与阉宦、朋党的冲突之中。

总计他一生，宦途生涯几乎达一甲子之久，直到宪宗元和七年（八一三年）十月壬辰病逝，享年七十八岁。政治生命的长远，也是国史上极为罕见的事情。他曾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与宪宗六个皇帝，担任过德宗、顺宗与宪宗三朝的宰相，位至三公，可说是国之大老。他一生的著作也很多，除了最著名的“通典”之外，还有“宾佐记”一卷、“管氏指略”二卷与“理道要决”十卷，这些作品直到宋代仍然十分盛行，流传很广，但今天除了“通典外”，其余都已经散佚无存了。

六

今日我们所见的“通典”，分门情形是：

食货	十二卷	卷一至十二
选举	六卷	卷十三至十八
职官	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四十
礼	一百卷	卷四十一至一百四十（其中历代沿革有六十五卷，开元礼三十五卷）
乐	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七
兵	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一百六十二
刑	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
州郡	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一百八十四
边防	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二百

杜佑在“通典”序中曾说明全书共分为八门，也就是现今通行本的兵、刑合为一门，他认为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他说：“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意思就是兵与刑是一体的两面，差距极微，只是有轻重的分别罢了。

唐代宗大历六年（七七一年），李翰为“通典”写序时也说是八门。到了宋朝，几部目录书籍如“直齐书录解题”、“郡齐读书志”等都说“通典”的编类为八门，但“直齐书录解题”是把礼与乐合而为一。另一方面，杜佑在他呈给唐皇帝的“进‘通典’表”却又说成九门。对这种分目上的岐异，清朝大史学家王鸣盛的解释是：李翰的序在“通典”定稿前早已写毕，因为门类未定，后来杜佑自己还有所更动。王鸣盛的解释颇为合理，因为“通典”撰述的时间长达三十余年，杜佑在撰述期间更动原先拟定的篇目是相当可能的。

至于“通典”撰述年代的问题，由于李翰序中提到杜佑从代宗大历初年开始纂写，杜佑自己也说长达三纪。因此，后代的史学家便在“大历之始”和“三纪”这两个字眼上大作文章，出现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从大历元年（七六六年）到贞元十七年（八〇一年）；一说自大历三年（七六八年）到贞元十九年（八〇三年）；另一说认为大历元年到贞元十七年完成，而十九年完成的是杜佑根据“通典”删节完成的“理道要诀”一书；也有认为其实根本不只三十六年。大致杜佑撰写的时间确实很长，至少在三十多年左右，可能在贞元十七年前已经完成，等到这年，他已经是位高名巨，这时候献上“通典”，既可以增加自己的声望，也可以提高“通典”的地位。

七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杜佑在撰写“通典”时所显现的史学方法。大要有三：第一、会通古今；第二、章法严谨；第三、剪裁允当。

早在唐代以前，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就指出中国史家撰述的弊病，他说：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舛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论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

这段话实在是史家必须遵循不渝的原则，但时代风气多“贱近而贵远，昧微而睹著”，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一直到“通

典”问世以后，才一扫唐世的弊风恶习。

“通典”中凡是叙述一项制度时，必上溯于上古三代，下及唐朝，罗举史实，详详细细说明经过原委，而且对唐代的制度尤其精详。清朝大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特别指出“通典”，正是可以通天下的不通，上达三王，下及当代，贯通古今，当之无愧。梁启超更称赞说：“有通典而政制通”，就是指会通古今这一点。

典章制度史的撰述，最忌讳的是杂庞无归，漫无所依，如果编撰者不能匠心独运，妥善分门别类，很容易陷入资料庞杂、毫无头绪的泥淖当中，无法探究每一制度的原由始末，这样就失去会通的意义了。更甚者往往又是搜罗无度，把一切讨论制度的史料，通通纳入书中，章法不严，取舍不一，又无标准可为凭恃，如此一来，便形成史料的大杂烩。

有唐一代学者的毛病正是如此，李翰在“通典”序中很明白的说明这一种现象。而杜佑“通典”，分为九门，每一门再分以细目，列举史实与历代的议论、批评，逐一返本探原，将礼乐政刑的始末，千载制度的变迁，都纳入二百卷之中，使读者一目了然，这是相当独特的贡献。

另一方面，我们再从杜佑仕宦的经历来看，总计他一生之中，曾担任过数十个职官。假如从大历元年开始撰写“通典”算起，到贞元十七年呈献给皇帝为止，三十六年里，杜佑的简历大致是：司法参军、主客员外郎、工部郎中、青苗使、抚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金部郎中、江淮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判度支、苏州刺史、饶州刺史、御史大夫、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尚书右丞、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礼部尚书兼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濠节度使。